

内部控制治理效率: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的研究

林钟高¹, 曾祥飞², 储姣娇¹

(1. 安徽工业大学 会计系, 安徽 马鞍山 243002; 2. 安徽工业大学 财务系, 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 内部控制治理的本质是控制权配置, 内部控制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借助于控制权配置, 通过由内部控制治理环境、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效率释放互动框架, 实现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大化。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控制权配置效率最大化, 基本的衡量标准是内部控制治理收益与内部控制治理成本对比。

[关键词] 内部控制治理; 内部控制治理效率; 控制权配置; 成本收益; 适度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 F23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1)01-0081-09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思路

对内部控制效率的评价, 目前主要是从内部控制的目标、基本内容和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和总结的。有的学者从满足“外部需求”(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以及监管部门和中介机构希望通过内部控制减少意外情况和资产损失, 并且以有效的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可靠性有合理保证, 防范财务报告舞弊)和“内部需求”(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过程实质上是对企业大量的信息进行管理以支持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决策过程和保护企业的资产, 合理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角度加以论证^[1]。有的学者则分别从内部控制系统要素的作用提出效率评价的主要观点, 包括为了组织的利益而防范舞弊, 在保证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关注监督、风险和资源配置。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注重战略、结构、业绩、动机以及激励等方面; 有效的内部控制包括信任、边界明晰、诊断准确以及互动等方面^[2-3]。COSO 报告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应该是“内置于”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全员参与的动态和自我评估系统, 其有效性体现在企业目标的实现、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得到遵循。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有三大标准, 即适时适量、明确授权以及成本效益原则。张宜霞认为, 从本质上来看, 内部控制的效率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 它应当是相对于相关目标的实现来说的^[4]。从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保证水平来看, 内部控制的效率是指内部控制为相关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的程度或水平, 其实际变动范围可以从 0 到 100%。从过程的角度来看, 企业内部控制设计的质量、运行的好坏都会直接影响到最终能为相关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的程度。从结构的角度来看, 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各个控制程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这些组成要素和控制程序的效率及其相互作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着内部控制整体的效率。

借助经济学从三个角度对效率问题所进行的分析, 内部控制效率也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察。首先, 从资源配置角度考察, 即在给定的技术、劳动、资本等要素条件下, 考察制度的资源是否在控制

[收稿日期] 2010-06-28

[作者简介] 林钟高(1960—), 男, 福建泉州人, 安徽工业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财务会计、独立审计、内部控制研究; 曾祥飞(1980—), 女, 安徽芜湖人, 安徽工业大学财务系讲师, 从事内部控制、集团财务研究; 储姣娇(1986—), 女, 安徽安庆人, 安徽工业大学会计系硕士研究生, 从事内部控制、公司会计研究。

活动中得到了合理配置,使所有相关者获得最大化效用,实现帕累托效率或称帕累托最优。其次,从控制活动过程的投入与产出角度考察,即考察控制活动的产出成果与投入之比,若成本收益比值越低,则表明效率越高;反之,则效率越低。再次,从信息有效性角度考察,即考察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效率(或股票市场效率)的程度^[5]。由于资本市场的信息瞬息万变,特别是还存在信息披露虚假等问题,资产价格是否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各种相关信息,成为决定资本市场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①。

以上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分析方法虽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衡量标准,但是都没有抓住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本源问题。一方面企业是协调社会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如果撇开外部的环境不说,单就企业内部的运作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企业内部参与者之间合理配置与企业运行有关的权利、责任(主要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确保他们之间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存续和扩展。这就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实质^[6]。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其内部存在一个控制机制,来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这可视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本质^[7]。

从企业内部控制发展的历史看,两大现象引人注目:一是从共时性看,不同国家、地区以及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千差万别的;二是从历时性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即从内部牵制治理到内部控制治理再到基于风险控制的内部控制治理模式。对这两大现象,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共时多样性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企业内部控制历时多样性是不同企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果。这样的解释是有缺陷的,其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缺乏产权尤其是控制权配置制度对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按照对产权内涵的理解,产权最终应当体现为对企业的收益享有权以及与收益有关的所有权。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个人激励的决定性因素,是促进企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因素,具有巨大的保险功能和约束功能,因而合理的产权制度对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运行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产权制度作为分配、行使有限资源管理权的结构^[8],在三个层面上支配着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9],即从所有者角度看,产权制度支配着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效率,从经营者角度看,产权制度支配着经营者对管理者的控制效率,从产权契约角度看,产权制度支配着管理者对员工的控制效率。现有的研究大多忽视了产权制度尤其是控制权配置制度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其次,把参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个体当作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忽略了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影响。把企业概念化为理性的行为者而忽视企业作为组织协调内部成员利益差别的复杂的政治过程,也就是忽视了企业内部控制内生演化的方面。这样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内部控制的共时多样性问题,因为在竞争的作用下,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内部控制应该收敛于某一种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而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明显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内部控制的历时多样性问题,因为静态地、逻辑地比较给定条件下不同内部控制结构交易成本的差异,不能从动态和历史的视角令人信服地说明演化问题,这样的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选择论。正如周业安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10]。最后,仅仅从微观个体成本与收益理性计算出分析整体的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效率,就会面临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冲突,以至于用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说明制度变迁差异性与多样性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忽视了内部控制制度变迁的物质基础性。本文在评述现有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及其度量文献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成本收益视角进行研究。我们之所以选择成本收益视角来论证内部控制效率问题,除了本文前面所论述的理由和依据之外,还来自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有关规定的启发。

^①根据诺思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标准,内部控制适应性效率是指处于该项制度下的人或组织同该制度的适应程度。由于适应性效率客观上难以进行数量描述,因而除了在该制度约束下的行为主体能够直接体验到适应性效率外,外部观察者通常只能先对一项制度约束下的人或组织的“产出”结果进行观察,再通过比较来发现该制度的效率。本文考虑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效率已经有学者做了研究,本文主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内部控制效率进行研究。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六条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一是适应性,即内部控制应当合理体现企业资产经营规模、业务范围和特点、风险状况以及所处具体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并随着环境变化、业务调整、管理要求等不断改进和完善。二是成本效益,即内部控制应当在保证有效性的前提下,合理权衡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争取以合理的成本实现更为有效的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在设计与实施内部控制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控制制度和控制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内部控制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是追求内部控制制度效用的最大化。

二、从成本收益视角看内部控制效率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视角出发,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则大都从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来解释,并且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假定内部控制制度所提供的服务或实现的功能为既定,则选择费用较低的内部控制制度是更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另一种是假定内部控制制度选择的费用为给定,那么能够提供更多服务或实现更多功能的内部控制制度则是更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11]。

可见,公司内部控制治理,从静态上看是一组治理机制有机组合构成的治理体系,从动态上看是具体的治理机制的实施与运行。无论是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治理机制的运行,我们都需要花费成本,当然也应该取得治理效果(如减少了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了企业的价值等),通常称之为治理收益。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察,最优的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是在给定的治理成本条件下实现治理收益最大化,或者在给定的治理收益条件下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内涵可界定为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的比值。比值越大,表明治理效率越高;反之,则表明治理效率越低。也就是说,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是指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内部控制治理成本与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的比率。衡量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标准,就是内部控制治理成本最小化或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的最大化^①。以企业的某项内部控制制度创新为例,若企业实施一项新的内部控制制度安排(假定企业生产技术等外部环境不变),则从以下几个方面度量新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②。

(一) 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净收益与内部控制制度投入的净成本的比例

设 R_1 为企业实施某一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收益, R_2 为内部控制制度实施前的收益, 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净收益为 $NR = (R_1 - R_2)$; C_1 为实施某一内部控制制度后的企业的总成本, C_2 为在该内部控制制度实施前的企业总成本, $C_1 - C_2$ 意为实施该内部控制制度的净成本(即内部控制制度投入成本以 NC 表示); E_1 代表内部控制制度效率, 则 $E_1 = (R_1 - R_2) / (C_1 - C_2) = NR / NC$ 。显然, 内部控制制度效率与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净收益成正比, 与内部控制制度投入净成本成反比。因此, 提高内部控制制度效率可以从提高净收益、降低净成本方面进行。这一度量方法从逻辑上来说较为准确, 但只反

^① 内部控制治理收益就是指企业在实施了各种内部控制治理活动后引致的利益相关者增加的收益(效用)总和。若以 E_i 代表内部控制治理效率, 用 i 代表引起各种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的成因或方式(内部控制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治理机制或其组合), 用 R_i 代表与引起不同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的成因或方式相适应的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效用), X 代表影响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环境因素(政府行为、法律制度、产权保护、市场化水平、信用体系、契约文化等), 且在既定的内部控制治理环境中, 一家公司的内部控制治理成本目标($C * f_g$) 给定, 则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优化问题等价于内部控制治理收益最大化, 用公式表示为 $\text{Max} E_i \Leftrightarrow [\text{Max} \{ \sum R_i(X) \mid R_i = R_1, R_2, \dots, R_n; X = X_1, X_2, \dots, X_m \}]$ 。内部控制治理成本是指内部控制治理主体实施内部控制治理活动所发生的成本总和, 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第一, 治理的交易成本, 指公司内部各责任控制相关主体在进行内部交易的整个过程中运用资源的成本, 包括信息搜集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 第二, 代理成本, 即由于内部管理人员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企业价值减少的绝对值; 第三, 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 指建立公司组织机构以及为确保这些权力机关正常运转所耗费的成本; 第四, 遵循成本或执行成本, 即公司为执行正式制度所产生的成本, 包括集体决策成本、风险承担成本、制度摩擦成本等。若以 C_i 代表各种不同的内部控制治理成本, 其他符号同前, 且在既定的内部控制治理环境中, 一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目标($R * f_g$) 给定, 则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优化问题等价于内部控制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用公式表示为 $\text{Max} E_i \Leftrightarrow \text{Min} \{ \sum C_i(X) \mid C_i = C_1, C_2, \dots, C_n; X = X_1, X_2, \dots, X_m \}$ 。

^② 本文借用郑兴山等关于产权制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理论^[12], 阐述内部控制效率的成本收益观念。

映了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平均效率,且难以用于内部控制制度之间的比较。

(二) 内部控制制度的对比效率

设 R_2 基本保持不变,且内部控制制度实施的净成本 NC 基本固定,则可用 $E_2 = R_1/NC$ 近似地表示采取某一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如果企业采用另一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收益是 R_1' ,且净成本 NC 不变, $R_1 > R_1'$,则实施前一内部控制制度更有效率。内部控制制度的对比效率方法简单实用,可对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缺点是对不同的对象没有可比性,而且实施不同的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净成本 NC 常常变动而使这一方法缺乏准确性。

(三) 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效率

设 MR 表示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收益, MC 代表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成本, ME 表示采取某一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效率,则 $ME = (MR/MC)$ 即表示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效率。这一度量方法可以判定采取某一新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若 $ME = (MR/MC) > 1$,则称新内部控制制度是有效的;若 $ME = (MR/MC) < 1$,则称新内部控制制度是无效的;若 $ME = (MR/MC) = 1$,则由此可以确定内部控制制度收益的最大化边界。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用来判断内部控制制度变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且度量准确易行,缺点是不能反映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平均效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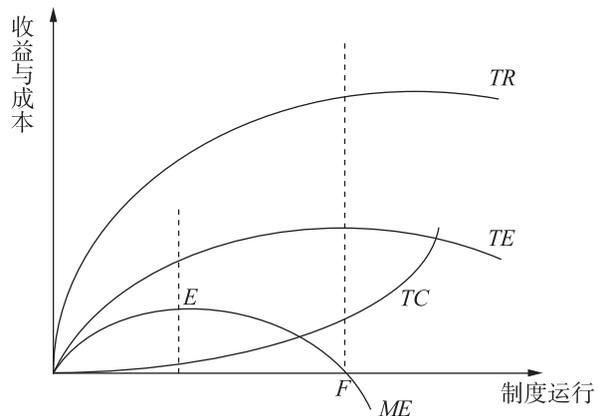


图1 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变化

我们借用黄少安关于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变化的一般关系图形^[13],来说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倒U型特征”,如图1所示。

一般来说,内部控制制度变革过程中的总成本和总收益都是递增的。内部控制制度变革若得以实行,则收益肯定是大于成本的,所以总收益曲线 TR 一般位于总成本曲线 TC 的上方,据此得出总效率曲线 $TE = TR - TC$ 。由此也可以得出边际效率曲线 ME ,并且可以看出,在 E 点边际效率最高,在 F 点边际效率为零,此时改革取得的效果最好,这时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额度最大。如果在 F 点之后现存内部控制制度仍在运行或内部控制制度的投入仍在增加,则边际效率 ME 为负,从而内部控制制度的总效率下降,相应的总效率曲线在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于是内部控制制度效率曲线呈现出倒U型特征。正是由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下降,甚至损失,从而产生了内部控制制度变革的动力。

(四) 内部控制制度的组织效率

组织效率是指组织目标的达成情况。由于企业组织是许多主体契约的联结,因而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组目标所构成的目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最优化模型。就目前主流的看法而言,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向量可以解释为组织价值(或经营成果)的最大化、财务报告与会计披露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财产和债务的安全性、持续经营和长期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等。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追求其目标、实现其使命的过程便是提高组织效率的过程。

内部控制是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我们不妨假设其他一切不变,将组织效率(OE)与内部控制(IC)的函数关系描述如下: $OE = f(IC) - g(IC)$ 。其中, $f(IC)$ 表示内部控制效益(由于内部控制所导致的组织效率的提高), $g(IC)$ 表示内部控制成本(由于内部控制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以及内部控制对组织效率的牺牲)。显然, $f(IC)$ 和 $g(IC)$ 都是随着内部控制的增加(深度、广度、精度等)而递增的。这就出现一个最佳内部控制点的问题,即内部控制并

不是多多益善,而是有一个合理的度。这与经济学上大多数成本效益权衡模型并无二致^[14]。

以上更多的是从治理成本的角度分析内部控制治理的效率,笔者在此借用一个概念,即内部控制治理强度。所谓治理强度主要指企业内部控制主体的激励与约束程度,它取决于代理人(两层代理)实际行为的结果与出资人要求的收益最大化情况下理想的控制行为之间的差距^[15]。显然,当内部控制治理强度增强时,代理成本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减少,但其他成本却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增加。当代理成本的下降大于其他成本的增加时,总成本将呈现下降趋势;反之,总成本则会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总成本与治理强度表现出 U 形曲线关系^[16]。笔者设代理成本为 C_1 ,其他成本之和为 C_2 ,则 $C = C_1 + C_2$ 。 C , C_1 和 C_2 同治理收益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如果 C_1 大于 Q ,这时 C_1 就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下降, C_2 则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增加。由于 C_1 下降的速率大于 C_2 上升的速率,故总成本趋于下降,直到 $C_1 = C_2 = Q$ 达到均衡。在这点上,总成本 C 最小,边际治理收益等于边际治理成本,内部控制治理效率达到最优。当继续增加治理强度,这时 C_1 下降的速率小于 C_2 上升的速率,总成本增加,尽管总的治理收益也在增加,但边际治理收益却呈递减之势,从而使内部控制治理效率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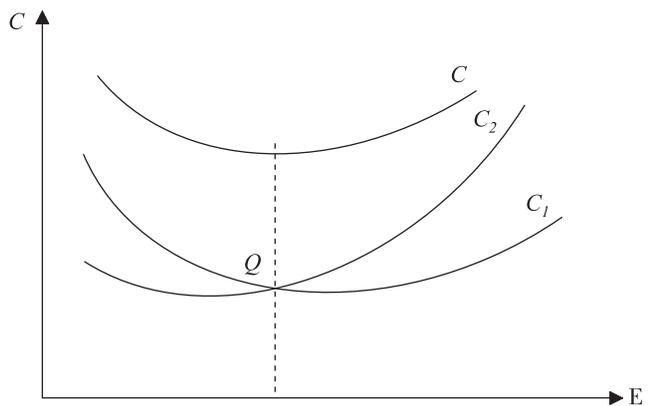


图 2 C, C_1, C_2 和治理收益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内部控制治理过程中,治理强度并不是越高越好、代理成本越小越好,而是在代理成本与其他相关成本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因此,公司内部控制治理中存在着最佳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而这种最佳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将导致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最优化或内部控制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三、基于成本收益模型的信任——适度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规范之所以能够塑造出统一的和连贯的行为和获得某种信任之外的行为效果,就因为人们对内部控制规范以及由这些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给予信任^①。以往研究表明,信任和内部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说明信任程度影响着内部控制的效果^②。

从现有的文献看,有关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基本的看法有三种:第一,信任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 Bradach 和 Eccles、Merchant、Ouchi^[17-19]。在 Ouchi 建立的经典控制模型中,信任机制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即社会控制或家族控制。第二,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一种替代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 Das 和 Teng, Dyer 和 Singh, Gulati,

①我们认为企业内部控制,一方面是源于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是得益于信任半径的扩大。内部控制发展历史表明,在本来不认识的人之间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内部控制范围扩大和内部控制发展的关键,更是内部控制发挥效用的核心。

②如果把为了达到组织内部信任(TD)的努力而发生的费用支出或消耗定义为组织的信任成本(TC),把因为组织中信任的降低而增加的各种费用支出定义为组织的不信任成本(FTC),则组织内部的信任与信任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信任与不信任成本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如果使用信任度描述组织内部的信任,并且假设用 X_1 和 X_2 分别表示组织成员的预期行为和实际行为,且 $\Delta = |X_1 - X_2|$,则信任度可以表示为 $TD = 1/\Delta$,在组织中提高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TD),将增加信任成本(TC),同时减少组织中的不信任成本(FTC),反之亦然。由于不适当的组织重构会降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这将增加协调成本或不信任成本,而信任度的降低却不能减少组织已经耗费的信任成本,即此时的 TC 不会下降。因此,不适当的组织重构将增加组织的总运行成本。可见,不同程度的信任对组织成本和绩效的作用是不同的,合作中信任的成本和风险,可能使顺向信任出现过度或不足的情况。如果过分推崇信任,组织中的监督、激励机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将导致代理人的投机行为。信任不足不仅会引起潜在交易成本的增加,而且由于缺乏信任而导致合作失败,还会影响组织中的信任水平与逆向信任程度,使组织凝聚力降低。

Inkpen 和 Currall, Zaheer 和 Venkatraman, Sitkin 和 Roth^[20-25]。根据这一替代性观点,低信任导致正式的控制形式,而高信任则使得正式控制的范围受到限制。正式控制传达不信任的信号,因而导致不信任和正式控制。第三,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一种互补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 Das 和 Teng^[26]等。这些学者断言,信任和控制机制构建都是有代价的,控制机制的选择、发展和执行的代价都是昂贵的。信任也不是免费的,需要耗费组织大量的资源。既然信任与控制的获得是成本高昂的,学者们认为组织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确立过度的信任,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为达到最低限度的管理信任,管理者可以利用信任和控制以相互补充。我们认为,内部控制与信任通过不同的方式增加内部成员在交易中的可预测性,通过内部控制与信任的互补关系,相对可以更真实地描述信任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动态性。廉价而高效的内部控制的存在使得企业较少依赖信任,而当信任存在时企业可以降低因设置内部控制机制而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然而,大多数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同时包含了内部控制与信任,包含风险的内部控制的存在可能鼓舞公司承担更大的、基于信任的风险。

根据 COSO 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董事会、管理层和员工共同设计并实施的,旨在为实现组织目标(主要包括经营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简称三类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它主要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几个方面的内容”。根据这一定义并结合以上的三种信任形式分类,我们得出了重要结论,即信任既是内部控制的基础,更是内部控制的保证。

内部控制规范和约束企业经济行为的首要条件是制度的完备性,但在现实中,由于内部控制制定者的“有限理性”和会计经济环境的未来不确定性,制定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定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内部控制表现为一种“不完备契约”,比如控制疏漏、控制笼统、控制偏离现实等方面。内部控制的不完备性必然导致当事人(企业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把剩余部分留给“隐含契约”,而隐含契约的实施主要是靠当事人的信誉来维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部控制的不完备性和隐含契约是信誉存在的前提条件,而信誉则是隐含契约实施的基础^[27]。不完备的内部控制只有在得到信誉、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作。比如,控制疏漏、控制笼统和控制误导,一个有信誉、有道德的当事人会选择被认为是合理的解释和恰当的方式处理,尽量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采取合作行动。“心照不宣”的信誉即使在形式上是非正式的,但其功能与正式制度一样具有“强迫性”,它诱导人们在正义与非正义、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做出适当选择,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即使动用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内部控制的执行,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也与当事人是否重视信誉有关。

更进一步地从逻辑层面解释,内部控制规范作为普遍的、无人格的行为准则,总是超越于具体的行为个体,这种普遍规范固然神圣而崇高,但其外在的形态下却未必能为行为个体所自觉接受并化为个体的具体行为。如何使普遍性的规范化为个体的行为,如何保证普遍的规范在个体行为实践中的有效性,这无疑应当对道德、信誉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道德、信誉具有将规范内化为个体以形成人格需要的功能。外在的、普遍的规范只有通过理性的体验、情感的认同以及自愿的接受,逐渐融合于个体自我的内在道德意识中,才能在众多个体的实践中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信誉是内部控制运行的基础,是内部控制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28]。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的收益与成本的变动可以用下页图 3 描述^①。

从下页图 3 中可以看出,在信任建立的过程中,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等的。一开始,信任的收益要小于信任的成本,而一旦达到一定的信任程度,如图 3(A) 中的 T1,信任的收益大于信任的成本,信任在组织关系中可以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我们将其称为组织内部信任的起始点。

^①本节内容主要参考《组织内部信任——理性控制最优模型的建立》一文的思路^[29],并根据本文的实际情况需要,对收益成本模型做了必要的修正。

理性控制的收益与长期成本之间的关系与信任类似,但是由于理性控制短期成本的不规则变化,使得理性控制的短期成本与收益之间形成两个交点(见图3B),这两个交点之间形成的阴影由于短期成本大于收益而预示着理性控制对组织内部的合作有阻碍作用。前面的一点 X_1 显示组织建立之初理性控制的效果不十分明显,而且由于理性控制的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在此阶段不能通过健全理性控制而获取组织满意的收益。因此,在理性控制的基础上建立组织的合作关系,必须是在理性控制手段比较健全时(如 X_2 点),我们将其称为组织内部理性控制的起始点。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信任的起始点要比理性控制的起始点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在初创时期更多的要依赖信任,而在成熟时期更多的要依赖理性控制。由于信任与理性控制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因而可以建立一个组织中最优信任-理性控制的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比较信任、理性控制各自的收益与成本,从而形成信任-理性控制的不同组合。

以上模型从概念上说明了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信任-适度内部控制的最优水平,表明组织中过度理性和过度信任都是不可取的,但也并非要精确地量化界定组织中的何种信任程度能达到最优。不适当的控制和信任会对企业内部控制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过于信任价值较低(相应的就是风险程度较高)的内部成员(或者岗位),可能会错误地分配珍贵的资源或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从而影响内部控制的绩效,也即对信任的投入有时是过度的,但过度信任将加剧滥用的行为(如监督不力、使机会主义免于惩罚等);相反,对有价值的内部成员(或者岗位)缺乏应有的信任,可能会导致错过节省成本或发展对实现内部控制目标有重要意义的组织能力的机会^[30]。在较高的信任状态下进行过多的控制可能会导致无必要的成本支出,延误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可能损害信任的基础。也就是说,信任也可能不足,交易成本是决策者对他人的过度怀疑,“囚徒困境”中合作双方由于互不信任,对违背诺言的预期会使他们在交往中自动违背诺言。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绩效,在信任和控制之间会存在一种优化或两者的最佳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合作者维持着适当的信任,并根据信任的情况实施合适的控制方式和控制程度,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对两者关系优化的有效判断。总之,内部控制既可能与信任对立,也可以为信任构建一个平台,关键取决于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事前的、制度化的、公平的内部控制机制,有助于加强承诺,是建立信任的更加坚实和有效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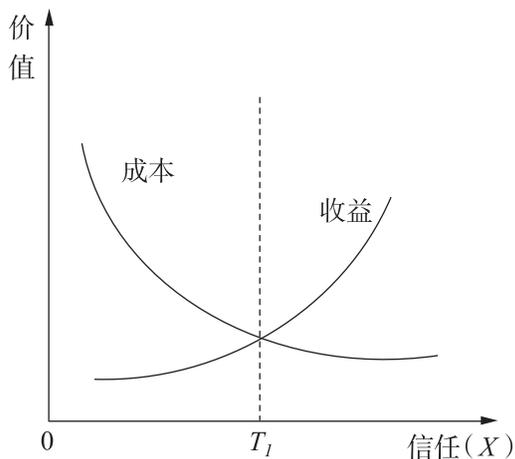


图 3(A) 信任收益成本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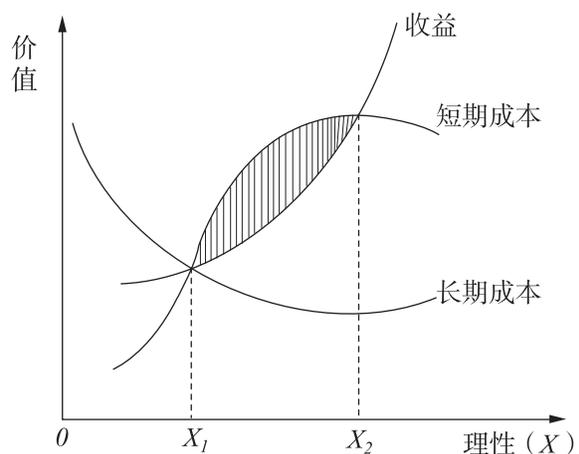


图 3(B) 适度内部控制收益成本比较

四、结语:基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内部控制治理体系重构

内部控制治理的本质是信任,内部控制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借助于信任,通过由内部控制治理环

境、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效率释放互动框架,实现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大化。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对比。从“收益与成本对比”这一“效率”的本质内涵来看,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精髓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在既定的内部控制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治理机制的有效搭配能够以尽可能低的内部控制治理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内部控制治理收益。也就是说,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是指实施了各种内部控制治理活动后所获得的收益(效用)总和与该内部控制治理活动所付出的成本总和之间的比较。

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首先,内部控制治理环境、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均包含效率释放问题,三者组成一个效率释放的良性互动框架,是内部控制治理效率产生的源泉。其次,内部控制治理环境是基石,内部控制治理结构是基础和内核,内部控制治理机制是引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是根本目标。再次,内部控制治理环境、内部控制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治理机制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四者共同构成内部控制治理体系,它们在内部控制治理体系中是一种上下游关系。最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标准制定是内部控制治理的基础,执行是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灵魂,责任追究是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基石,持续改进和完善是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生命。

参考文献:

- [1] Kinney J R, William R. Research opportunities of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quality assurance [J]. Auditing, 2000, 19:371 - 379.
- [2] Noordin S. Importanc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J]. Journal of Government Auditing, 1997, 31:456 - 467.
- [3] Michael G A, Srikant M D. How do you stop the books from being cooked? a management control perspective on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setting and the section 404 requirements of Sarbanes-Oxley ac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closure and Governance, 2003(10):25 - 36.
- [4] 张宜霞. 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与其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8(3):79 - 81.
- [5] 白俊, 王生年. 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基本问题探讨[J]. 商业时代, 2008, 30:75 - 76.
- [6] 林钟高, 郑军.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J]. 会计研究, 2007(10):53 - 61.
- [7] 刘明辉, 张宜霞. 内部控制的经济思考[J]. 会计研究, 2002(8):54 - 56.
- [8] 斯蒂格利茨. 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0(3):51 - 60.
- [9] 冯均科. 不同产权结构下的内部控制效率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1(8):28 - 33.
- [10] 周业安. 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J]. 经济研究, 2002(5):3 - 11.
- [11]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M]//科斯, 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2] 郑兴山, 等. 产权制度和企业绩效[J]. 经济体制改革, 2001(1):77 - 80.
- [13] 黄少安. 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4):37 - 49.
- [14] 方红星. 内部控制、审计与组织效率[J]. 会计研究, 2003(2):41 - 44.
- [15] 剧锦文. 公司治理的均衡分析[J]. 经济经纬, 2006(6):66 - 69.
- [16] 林万祥, 唐滔智. 公司财务治理的效率[J]. 会计之友, 2007(11):13 - 14.
- [17] Bradach J L, Eccles R G. Price, authority, and trust: from ideal types to plural form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9(15):97 - 118.
- [18] Merchant K A. Control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M]. Marshfield, MA: Pitman Publishing, 1984:68.
- [19] Ouchi W G. Markets, bureaucracies and clan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0(25):129 - 141.
- [20] Das T K, Teng B S. Trust, control, and risk in strategic allianc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1, 22(2):251.

- [21] Dyer J H, Singh. The relational view: cooperation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18):535-556.
- [22] Gulati R, Singh H. The architecture of cooperation: managing coordination costs and appropriation concerns in strategic allianc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8, 43(4): 781-814.
- [23] Inkpen, Currall S C.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trust: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M]. San Francisco: The New Lexington Press, 1997.
- [24] Zaheer A, Venkatraman N. Relational governance as an interorganizational strategy: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ole of trust in economic exchang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6):373-392.
- [25] Sitkin, Roth S B, Nancy L. Legalistic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catastrophic illness: the effect of stigmatization on[J].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 Rights Journal*, 1993, 6(4):291-313.
- [26] Das T K, Teng B S. Resource and risk management in strategic alliance making proces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8, 24(1):21-42.
- [27] 李向阳. 企业信誉、企业行为和市场机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7.
- [28] 李心合. 会计制度的信誉基础[J]. *会计研究*,2002(4):17-23.
- [29] 周密,姚芳,赵西萍. 组织内部信任——理性控制最优模型的建立[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5):93-98.
- [30] Berman S L, Wicks A C, Kotha S, et al. Does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mat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 management models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42(5):488-506.

[责任编辑:高婷]

Contro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 Research Based on Cost-Benefit

LIN Zhonggao, ZENG Xiangfei, CHU Jiaojiao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control governance is control alloc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ontrol governance is to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control governance by means of the control alloca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framework of efficiency release. The core of max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control governance is to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control allocation, the basic criteria is to compare revenue and cost of control governance.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 governance; internal control; efficiency of governance; control allocation; cost-benefit; appropriate internal control